

---

#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大罢工的斗争策略

蒋国海<sup>1</sup>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中共湘区委员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思想与安源工人运动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领导安源大罢工取得了工人罢工斗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大罢工的斗争策略主要有四个主要方面: 科学分析矛盾, 制定正确策略; 依靠工人自己的团结和斗争; 利用矛盾, 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既立足于当前的经济斗争, 又着眼于未来的政治斗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安源大罢工 斗争策略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 (2018) 05-0070-08

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 是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阶级以独立自觉的姿态登上革命舞台的第一次公开大搏斗。“这一次大罢工, 共计罢工5日, 秩序极好, 组织极严, 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费用共计一百二十余元, 未伤一人, 未败一事, 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sup>[1][6]</sup>。

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成功范例, 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安源路矿支部经过长时间充分的调查研究、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之后, 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 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 指导工人斗争的结果。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的成功,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对安源大罢工的研究, 对于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研究党的历史, 认真学习党的历史, 全面宣传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 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科学分析矛盾, 制定正确策略

1922年9月初, 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安源视察工运, 在调查研究了各方面情况以后, 认定组织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 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议经过详尽讨论, 决定立即着手发动全体工人罢工。毛泽东并写信给李立三, 要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sup>[2]</sup>当时, 矿局除上年欠饷三个月之外, 本年又已欠饷两个月, 加之物价上涨, 因而过着牛马般生活的工人更加痛苦不堪。

发清欠饷, 增加工资, 改善待遇, 成了工人的日益紧迫的要求。7月, 与萍矿同属一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 因反对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而罢工, 并获胜利。消息传来, 安源工人倍受鼓舞。路矿当局见此情形, 深恐工潮延及安源, 竭力图谋瓦解和强行封闭工人俱乐部, 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慨, 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这样, 领导工人罢工, 不仅是湘区和安源的党执行全党政治任务的迫切需要, 而且成了安源工运本身能否向新阶段发展的关键。

萍乡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 同它休戚相关的株萍铁路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一个官办企业, 并且这两个企业都处在中国内地两省边境的山区和广大农村包围之中, 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较晚, 封建势力受到的冲击尚微。因

---

**作者简介:** 蒋国海, 男, 河南信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

---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安源路矿显得集中而尖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则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国内外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情绪普遍高涨；特别是以香港海员罢工为开端的全国工运高潮，直接影响到安源路矿社会矛盾的发展。这些，就是安源罢工发生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工人身受资本家、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三重压迫，“在这三重压迫下的无产阶级，他们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sup>[1]85</sup>。安源工人阶级自 1898 年诞生以来就有过一系列斗争。从 1901 年响应义和团运动，1906 年参加萍浏醴起义，到 1919 年 6 月响应五四运动，驱逐德国工程师以及痛打华洋监工，捣毁洋人住宅等等，正是他们解放的要求非常紧迫、非常激烈的表现。

毛泽东早在 1921 年 11 月同李立三谈话时就预见到，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sup>[2]</sup>而事实上也正如刘少奇、朱少连在分析安源罢工发生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sup>[1]147</sup>。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集中而尖锐，不仅决定了全体工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决定了工人众多而高度集中又特别能战斗的突出优点。因此，只要党善于“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sup>[3]</sup>抓住全体工人共同关心的最迫切的问题，就可以把全体工人调动起来。并且，从 1921 年秋冬以来，经过党的十个月左右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工人中知识水平较高、有一定威信先进分子，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处充当工人群众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影响。这样看来，革命力量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

外部环境中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的有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全国工运的高涨，已经和必将愈益鼓舞工人的斗志，同时，也确是使统治阶级感到“近年劳工风潮，已成趋势，莫可制止”<sup>[1]617</sup>。并且，安源虽地处一隅，但有株萍铁路与湖南相通，便于工人联络和湘区党委指挥。只要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条件的作用，争取各地的声援，就可以壮大罢工斗争的声势，使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支部会议，由于充分估计到内外环境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的一切有利因素，所以能够及时抓住时机，在有组织的工人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立即着手组织全体工人罢工。这一决定拨动了安源路矿社会中绷得最紧的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会议以后，罢工的准备工作进展极快。

9 月 9 日，李立三回到安源，随后，刘少奇也奉命到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这样，罢工斗争便成了弦上之箭。这时，毛泽东又给党支部写信，对罢工斗争的策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党支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基本口号，制定了义无反顾的罢工宣言，加强了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注意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制定的上述基本策略，像一条红线，贯穿着罢工斗争的始终，指引着斗争走向胜利。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sup>[4]</sup>。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安源路矿当时的独特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的成功应用。安源的工人运动从创办工人学校到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一开始就“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事情”<sup>[1]148</sup>，到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组织第一次大罢工，表明湘区和安源的党组织一开始就认真地把自已的活动同工人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创造出初步具有安源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制订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策略，使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初步具有本国的特色和安源的地方特色。这是安源罢工胜利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它的策略基础。

## 二、依靠工人自己的团结和斗争是罢工胜利的首要条件

安源工人运动发生之前，毛泽东曾经指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他认为，黑暗的中国社会，“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sup>[5]</sup>。罢工前，党在安源的工作，正是这种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潜在切实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革命风格的生动体现。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党在工人中的实力养成了，罢工的条件也就逐渐成熟了。故在罢工斗争中，党始终把基点放在依靠工人自己的团结和斗争上。

史料表明，在罢工斗争中，为着实现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地奋斗，党大致上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使工人认识团结和斗争的重要性，增强工人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在罢工的准备期间，利用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和其他各地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俱乐部和一些工作处分头日夜演讲，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sup>[1]149</sup>。说明俱乐部是县衙门立了案的，矿局也承认的正当机关，号召工人加入俱乐部，共同奋斗，工人人多势力大，只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就可以达到目的。

当罢工前夕向两局提出最低限度的三条要求以后，即向工人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说明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sup>[1]151</sup>。又多次召开各处工人代表会议，研究如何保证工友齐心，严守秩序，由代表把会议研究的结果传达到工人中去。在罢工期间，继续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工人代表的个别工作以及宣言、标语等形式宣传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遵守纪律和秩序、听从俱乐部的统一指挥。

提出了共同奋斗的明确目标。如前所述，党根据“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了哀而动人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同时，按照这一口号的精神，先后发表了两篇宣言，说明罢工原委。宣言倾吐了工人受痛苦受压迫的事实，揭露了压迫者摧残工人俱乐部的行径，说明工人是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宣言将罢工的目的归纳为三点：“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并围绕这三点提出了十七项要求，其中：属于改良待遇方面的（休假、死伤抚恤，改善食宿条件、不准殴打和虐待工人、减少劳动时间、包工改点工等）九条，属于增加工资、发清欠饷方面的五条，属于保障工人俱乐部权利方面的三条。

宣言号召全体工友，为此目标团结奋斗，誓以死力对待，坚持到底，并吁请各界援助。<sup>[1]152</sup>《罢工宣言》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以工人的苦难事实表明了罢工的正义性，恰当地提出了当时当地内外条件所许可的和必要的要求；既反映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又突出地强调了当前的迫切生活问题，既表达了先进工人的意愿，又照顾到广大工人以致其他人民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从而不仅激发了广大工人的斗志，而且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加强工人的组织，制定严明的纪律。首先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罢工中的各项重大问题，从决定罢工到具体部署，都是由党支部开会（团支部派人参加，有时则以团支部名义开会）讨论决定、由工人俱乐部具体执行的，党、团员则分头担任各种职务，贯彻党的意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除湘区委员会通知支部书记李立三立即回安源领导罢工，加派刘少奇到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外，罢工前夕，党支部举行会议，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因李立三早已公开露面，为了防止意外，决定他秘密策应，而由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代表，驻部应付一切。

同时，扩大了工人监察队，（即后来的纠察队），组织了侦探队。监察队佩带符号，手执白旗，满布街市和工厂附近，日夜巡逻和守卫，对内执行纪律，对外维护秩序，防止坏人破坏，准备随时与敌人作公开斗争，侦察队则四出秘密探听消息。并规定工人“各归住房，不得扰乱”，服从统一指挥，“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等项纪律，布告各处一体遵行；同时，每工作处（两局共有四十多个工作处）派一名代表常驻俱乐部上传下达消息和命令。这样，恰当地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团支部为重要助手，以党、团员为骨干，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组织形式的全体工人团结一致，“遇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sup>[1]156</sup>。

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特别是党的领导者身先士卒，在战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罢工前夕，当两局对俱乐部领导人大施恐吓

---

手段,妄图吓走俱乐部领导人而达到瓦解俱乐部的目的时,朱少连、蒋先云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光明正大之事业,死也不怕。”李立三回到安源后,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开安源。党的领导者们英勇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获得了群众的拥戴。

当工人得知矿局密谋杀李立三时,一面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面严加警卫,俱乐部领导人外出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工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以资保护。罢工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九月十六日,当戒严司令和路矿当局武力胁迫工人代表刘少奇答应先开工后磋商条件时,刘少奇不畏强暴,据理严词驳斥。此时,有数千工人赶来将戒严司令部团团围住,声言若敢动工人代表半根毫毛,便要打得两局片瓦不留。这样室内室外相互配合,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所有这些事实,都生动地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在保证全体工人团结奋斗当中的重要作用。

### 三、利用矛盾,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在把基点放在依靠工人的团结和斗争的同时,党一开始在安源工作就注意到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在创办工人夜校时,曾利用办平民教育的合法地位,由湖南平民教育机关介绍到安源,并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安源商会内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帮助,呈报县知事公署立案,由县知事出布告保护办学,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也曾呈请县署立案出示保护。这些对于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罢工斗争中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的策略,正是上述做法的继续和发展。

要得到别人支持,首先自己要有足够的力量,要使同盟者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前面我们说到,客观条件造成了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可能性,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战斗部署上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这是罢工斗争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对统治阶级产生威慑和分化瓦解作用的基础。同时,哀而动人的口号,义无反顾的罢工宣言,严明的组织和纪律,先礼后兵、据理力争的战斗部署,万众一心的决死反抗,等等,这些调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奋斗的有力措施及其实施结果,无疑地也包含了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意图,并且确实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党及时组织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罢工准备阶段提出的三条最低限度要求,宣布罢工的电报,罢工宣言等,都及时寄往长沙,由湘区委员会和工人团体帮助在长沙、汉口等地的报纸上发表。同时,陆续向报界发表罢工消息,刘少奇曾撰写了《萍安罢工五日记》的通讯,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党的湘区委员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给安源工人拍来电报声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全国各地许多工团也先后函电声援。这些声援函电也都在报上发表,从而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壮大了罢工斗争的声势,对于迫使路矿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军队同路矿当局本来是相互勾结又不完全一致的。军队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秩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对军队无损,故有可能使它中立。由于《罢工宣言》明确宣布罢工仅仅是为了增加工资,“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并且正是罢工爆发以后由于工人俱乐部的努力才使社会秩序井然,这就从舆论上剥夺了敌人武力镇压可能利用的借口。罢工爆发之后,工人对军队的镇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又严格限于防御和自卫,同时对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当矿局以每人二元钱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和各重要工作处时,即时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并向士兵们宣传。九月十六日上午,戒严司令李鸿程杀气腾腾地威吓工人代表刘少奇,“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又叫嚷要用万余军队来制裁万余工人。可是经过刘少奇和包围戒严司令部的数千工人相互配合地坚决斗争之后,当天下午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俱乐部,竟然“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入,请从速解决”<sup>[1]156</sup>。据《(略史)》记述,“李旅长(即李鸿程——引者注)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此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sup>[1]158</sup>。

路矿当局的首领分别是交通部和汉冶萍公司买办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同主子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但工人只是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并不直接危及他们个人的利益,因此,也有可以利用的因素。“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

---

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sup>[1]158</sup>。对于上司，则“甲党打电报攻击乙党，说此次罢工风潮由他们酿成，乙党亦如之”<sup>[1]159</sup>。特别是矿长李寿铨同副矿长舒修泰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党利用他们之间这些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在罢工前夕，副矿长舒修泰到俱乐部探听虚实，一面恐吓，一面又以给俱乐部津贴经费和房屋为言，希图笼络，借保无事。俱乐部领导人不为所动，反而向工人大力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sup>[1]148</sup>。因此消除了许多工人对俱乐部的疑虑。罢工期间，对于路矿两局，着重揭露矿局，对路局则比较缓和，在矿局内部，利用正副矿长之间的矛盾，使其就范，狠狠地孤立和打击了工人最痛恨的，破坏罢工又最猖狂的总监工王鸿卿。对其他职员和大多数工头均采取利用、争取其同情或中立的政策。

由于工人的团结战斗和全国各地工团声援的威慑，也由于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原来被请来镇压罢工的萍乡驻军最后采取了调停的态度，赣西镇守使署也奉到省督军促嘱和平解决的电谕，地方商绅则一开始就居中立的地位；路局方面，当时在北京的局长王昌学、在长沙的副局长肖五琴，均来电力主和平解决，矿局内部意见极不统一，有主张言和的，有主张拒绝谈判的。它的上司汉冶萍公司首脑机关则远在上海，鞭长莫及，而控制这个公司的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对维持萍矿已不大感兴趣。最后，矿局内部的强硬派因势孤力单，拿不出对抗罢工的实际办法，也只好同意与俱乐部签订协议。

#### 四、既立足于当前的经济斗争，又着眼于未来的政治斗争

安源罢工斗争，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着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的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和必要的斗争。然而，党并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斗争，而是把它看作是引向更高斗争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正如刘少奇在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总结工运经验时所说：“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的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地团结起来”<sup>[1]120</sup>。这一指导思想，在党组织罢工斗争中始终是很明确的。

首先，罢工宣言不只是用工人的苦难事实来博得人们的怜恤，而且把工人苦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黑暗。指出：“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在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虽然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但实质上已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这就使工人的眼光不局限于增加工资，而能看到未来的斗争。同时，也有利于争取一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压迫的人们支持。

其次，从罢工中提出的条件来看，大部分是涉及工人群众日常生活中直接利益的，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工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但宣言中把“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放在第一条。并且谈判中，对这一条坚持最力，最后作为第一条写进了三方签订的协议，从而争得了团体契约缔结权。这不仅有利于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且使工人群众组成一个阶级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就第一次“把雇主们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使工会运动“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sup>[6]</sup>。

再次，为着使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庆祝罢工胜利的群众大会上，李立三宣布了十三条协议之后，便初步总结了罢工斗争的成功经验，他着重指出：“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并指出群众还有许多的痛苦，“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工人俱乐部发布的《上工宣言》也指出，这次罢工胜利只是“第一次胜利”，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sup>[1]160</sup>。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的信中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

书记部号召工人为达到终极胜利而继续努力奋斗，并以‘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作为贺信的结语”<sup>[1]161</sup>。这样就使工人对“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有了新的理解，“从前是牛马”，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掌握政权和产

---

业，“现在要做人”，不只是一要改善目前的待遇，而且要做社会的主人，不仅要中国社会的主体，而且正如《国际歌》中所说的，“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罢工胜利后，党及时领导工人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由于罢工胜利，工人“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迹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乘此重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sup>[1]</sup><sup>162</sup>。并在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设立了分部。俱乐部所属纠察队、学校、合作社等组织也都大大地发展了。同年十月，俱乐部领导工人粉碎了职员工头组织的游乐部，取得了打破包工制的胜利，之后又领导湘东永和煤矿和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并使工人的斗争从厂内向厂外，支援水口山、大冶等处工人的斗争。

在此基础上，分别参加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为工人阶级的联合作出了贡献。在领导这些组织工作和斗争中，党、团组织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并于同年冬次年初成立了党、团地方委员会。至此，工人运动第一阶段的任务——团结工人阶级自己基本实现。安源大罢工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十三条协议”），“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联合”<sup>[7]</sup>。

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党支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应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安源罢工斗争也就能把目前的斗争同未来的斗争恰当地衔接起来，使安源工人运动的初期，“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在工人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斗争的同时，也就孕育着未来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因素，在罢工中发挥工人纠察队和侦探队的战斗作用，在同敌军对抗时又注意分化瓦解官兵的工作，由此得到启发，后来长期坚持和发展纠察队和侦探队，并派党员到矿警队开展秘密的兵士运动，这些就是未来武装斗争的萌芽，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sup>[8]</sup>这样就萌发了未来统一战线的要素，在整个斗争中，党支部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组织通过斗争也获得了发展，这就为未来党的建设创造了最初的宝贵经验，党在安源罢工中策略的成功，则为形成“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等著名的策略思想，提供了最早的素材。安源工人运动史上波澜壮阔的斗争，正是由这些“因素”和“萌芽”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对安源大罢工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初期创造了运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成功范例。

#### 参考文献：

- [1] 湖南革命史料选辑.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2] 李立三. 看了“燎原”以后[N]. 人民日报, 1963-08-04(03).
- [3]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9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69.
- [5]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61.
- [6] 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4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1.
- [8] 王雨田, 许祖华. 十七年“土改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2): 101-104.